



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

(1672—1697)

黑 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

(1672—1697)

黑 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 1672—1697 / 黑龙
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325-7528-2

I. ①准… II. ①黑… III. ①准噶尔—民族历史—研
究—1672—1697 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研究—中国—
1672—1697 IV. ①K289 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189 号

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

黑 龙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7528-2

K · 1986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获大连民族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及其意义	1
二、研究概况	2
三、史料与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2
第一节 噶尔丹执政以前准噶尔与中原的关系	12
一、斡亦剌惕、瓦剌到厄鲁特	12
二、准噶尔的兴起	18
三、准噶尔与中原的往来	25
第二节 准噶尔汗国的兴起	40
一、噶尔丹的早期活动	40
二、噶尔丹统一漠西蒙古及建立准噶尔汗国	47
三、噶尔丹征服回疆和向西扩张	55
第二章 清准往来(1672—1688)	63
第一节 清准通使关系的发展	63
一、噶尔丹屡遣使团与清准政治关系的新发展	63
二、奇塔特出使准噶尔与清廷对准政策的变化	73
第二节 清准关于青海、西套蒙古问题的交涉	81
一、关于青海问题的交涉	81
二、关于西套蒙古问题的交涉	84
第三节 清准贸易往来	94
一、互市贸易的迅速发展	94
二、清准贸易关系的性质	101

第三章 清准冲突	106
第一节 清准在喀尔喀的角逐	106
一、喀尔喀内讧与清准干涉	106
二、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与清政府的对策	116
三、清准关于喀尔喀问题的谈判	123
第二节 清准冲突对东北部疆域的影响	129
一、噶尔丹东进喀尔喀与东北部边境的紧张局势	129
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东北部疆域的影响	133
第三节 清准战争的爆发	137
一、噶尔丹南下内蒙古与乌尔会河之战	137
二、乌兰布通之战	146
三、多伦会盟与喀尔喀问题	160
第四章 清准冲突再起	169
第一节 康熙亲征噶尔丹	169
一、清廷诱歼噶尔丹的努力	169
二、康熙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	175
三、战败后的噶尔丹	192
第二节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	198
一、围剿兼招降	198
二、安置俘虏降人	208
第五章 清准战争的结局	213
第一节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	213
一、康熙亲临宁夏筹办军务	213
二、清准使节往来与政治攻势	217
第二节 噶尔丹的败亡	220
一、艰难的最后时刻	220
二、噶尔丹的死期和死因	223

三、准噶尔其他重要人物的结局	230
结论：准噶尔蒙古的兴衰对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版图的影响 ...	236
一、准噶尔部控制的疆域范围	236
二、准噶尔部扩张对清朝的影响	238
三、准噶尔部衰亡与清朝奠定疆域版图	245
四、试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割据”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8
一、史料	258
二、著作	262
三、论文	266

绪 论

一、选题及其意义

准噶尔(jegün γar),汉意左翼,是指以绰罗斯贵族为主体的卫拉特蒙古的一个部落。后来准噶尔部强大,统辖四卫拉特,准噶尔遂成为整个西北卫拉特蒙古的泛称。

自17世纪上半叶开始,准噶尔贵族逐步统一卫拉特各部,雄踞天山南北,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建立后与清兴盛时期的顺、康、雍、乾四朝相恃长达百余年,双方有着频繁的政治、贸易往来,从而形成了起伏跌宕、纷繁复杂的清准关系。这种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纵观清代历史,可以说清朝西、西北、北、东北疆域的形成与准噶尔的兴衰密不可分,因此对该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与清朝的关系是整个清准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双方的贸易往来,还是军事冲突都是前所未有的。对此前人研究成果颇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多年来人们对清准关系史的研究集中于战争,而对于政治关系、贸易往来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零星分散、缺乏系统。因此,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陆续发现的各种文字史料,对上述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上,准噶尔人的先世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所以每个朝代都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活动。至清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著述中有很多关于准噶尔人的事迹和清准关系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然而,在顽固的汉族封建传统观念和蒙古族黄金家族正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下,有的著述不能客观公正地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后人又留下了迷雾重重的准噶尔历史。民国初年,编纂出版的《清史稿》中,对清准关系的记述,仍循中原史家之旧路,鲜有创新。而后的萧一山《清代通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等在论述清史、西北边疆史和清准关系史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其翔实程度在当时研究中还是前所未有的。

建国以后,随着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发展,蒙古史、卫拉特史、清史、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逐步深入,清准关系史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迄今发表的有关清准关系史的论文近百篇,十几部专门史、断代史、简史、通史、地区史、民族史的著作也都涉及清准关系的内容。总观这些成果,在运用正统史料、梳理清准关系的演变过程,评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由于各类档案史料的限制,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不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环境逐渐改善,研究条件日益完善,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清准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使研究取得突破成为可能。如,大量清代官私史料被整理出版;深藏内廷长达数百年的各种文字的历史档案也可开馆查阅或被整理出版;掌握蒙汉满藏等多种文字的青年学者不断涌现并开始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开展研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都是前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

二、研究概况

在准噶尔汗国史和清准关系史研究成果中,首屈一指的是前苏

联学者伊·亚·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1964年出版)。这是迄今我们所知第一部系统论述准噶尔汗国历史的著作。作者利用大量的俄国档案史料和托忒文献,对准噶尔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观点。1980年马曼丽教授翻译出版该著作后,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和称道。该书第四章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之间的政治关系、贸易和战争,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仍不乏说服力。然而在探讨清准关系时,该书所引用的史料几乎全部来自《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一书。兹氏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视为一部原始档案汇编,从而对它的史料价值深信不疑,无视该书大量删改和增减原始档案的事实。因此,兹氏的研究成果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弘首次日译并发表了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给皇太子写的87封满文亲笔信(当时藏于台北故宫),刊行了《康熙帝的信件》(1979年出版)一书,为推动清准关系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对准噶尔蒙古史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国的卫拉特史研究起步较晚,建国初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只有极少数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反映清准关系的有金启琮《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这是建国以后第一篇研究卫拉特蒙古与清朝互市贸易的文章。作者分三个阶段对1642—1753年双方贸易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强调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与互市的辩证关系。该文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钟翰先生《胤禛西征纪实》一文,依据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抚远大将军奏议》,论述了1718—1720年清军入藏打败准军的基本史实,为后人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仁成《论噶尔丹的历史作用》、庆思《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室《谎言改变不了历史——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

耻谰言》，王宏钧、刘如仲《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等论文，将准噶尔汗国对清朝的抗争视为叛乱，认为噶尔丹对社会发展并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全盘否定了噶尔丹的历史活动。

20 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卫拉特史研究发展迅速，成就突出。已发表的论文、译文等多达 400 余篇。著作有合著《准噶尔史略》（1985），杜荣坤、白翠琴《西蒙古史研究》（1986），马大正、蔡家艺编著《卫拉特蒙古史入门》（1989）等。其中，《准噶尔史略》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准噶尔史，此书专设章节论述了清准关系，在初步理出清准关系史的基本脉络方面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发表的涉及康熙朝与准噶尔汗国关系史的论文中，反映双方战争的论文占有突出地位，如洪用斌《昭莫多之战》、吕一燃《噶尔丹“服毒自杀”说辨伪》、李绍明《清初平定准部扰藏和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成昌文《清代前期“平准保藏”挫败沙俄染指西藏的斗争》、郭蕴华《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杨若薇《论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范沛淮《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时间》、任凭《康熙三次对准部噶尔丹战争述评》、劳潍《康熙是怎样平定噶尔丹叛乱的》、罗丽达《一七一七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清朝平定西藏的斗争》、杨生泉《论清代前期的“平准保藏”斗争》、陈金钟《阿尔布巴阐述平定准噶尔之战》、孟昭信《康熙亲征噶尔丹的时间问题》、邢玉林《乌兰布通之战》、洪用斌《试论乌兰布通战争的结局》、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王思治《康熙帝对乌兰布通之战的检讨与多伦会盟》、彭普生《噶尔丹之死》、周以芬《噶尔丹怎样死的？》等。总观上述论文，数量可观，研究领域较前拓宽，观点颇有创新。

有关人物评介的论文有张植华《略论噶尔丹》、马大正《噶尔丹与沙俄》、马曼丽《评论噶尔丹与俄国的关系》、巴赫《论噶尔丹》、乌日娜《从多伦会盟前的国内外局势看噶尔丹其人》、江波《噶尔丹的东方政策》、蔡家艺、范玉梅《策旺阿拉布坦功过评述》、蔡家艺《略论

策旺阿拉布坦》、宋嗣喜《策旺阿拉布坦与沙皇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前后》、江波《策旺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的兴盛》、宋嗣喜《策旺阿拉布坦与沙俄》、许曾重《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等。这些论文中,马曼丽、江波、巴赫、乌日娜的论文开始对噶尔丹的历史活动给予肯定,对策旺阿拉布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某些观点仍需商榷。

有关清准双方互市贸易的文章有蔡家艺《清代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贸易往来述略》、《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两份准噶尔购货单分析》、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的民族政策》、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等。上述文章虽然数量有限,但勾勒出了清准之间各个时期贸易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同中原贸易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对噶尔丹统治时期同内地贸易前所未有的发展还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随着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以及我国的蒙古史、清史、满蒙关系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清准关系史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一部卫拉特蒙古通史性著作《卫拉特蒙古简史》于1992年问世。该书在清准关系史的描述上广泛采用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对之加以总结和概括。1993年出版的《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是深受学界好评的一部清代蒙古史专著。该书利用汉文以外的大量托忒文、藏文和满文史料,比较客观公正地评论了清准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此外,那木斯来《准噶尔汗国史》(蒙古文)、合著《蒙古族通史》、卢明辉《清代蒙古史》、白翠琴《瓦剌史》、乌云毕力格《和硕特史略》(蒙古文)、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日]若松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日]宫胁淳子《最后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德]W. 罗玛诺夫斯基《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战争:对事实

及其原因的叙述——以〈清实录〉为依据》等专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清准关系史方面的内容。

内蒙古大学在清准关系史研究中做出了新贡献。齐木德道尔吉《昭莫多之战以后的噶尔丹》、《康熙之路——记康熙皇帝首次亲征噶尔丹》等论文开启了国内学者利用满文原始档案史料研究清准关系史的先河。在昭莫多之战以后噶尔丹的行动路线和活动,尤其是对噶尔丹致达赖喇嘛、第巴等青藏地区僧俗上层的12封信和噶尔丹的死期、死因以及康熙首次亲征噶尔丹途中的种种艰难困苦,最后充满沮丧、无功而返等史实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引人瞩目的观点,使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乌云毕力格《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及流传》一文,通过史料学批判,发现了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的原始档案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被删改现象,此项研究已超过前人。宝音德力根《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讧》(蒙古文)也是一部创新之作,通过对清代蒙古文历史档案的研究,发现了清代官修史书对于喀尔喀内讧史实的恶意篡改。文章还认为康熙皇帝调解喀尔喀内讧的动机是与噶尔丹争夺喀尔喀。康熙偏袒左翼土谢图汗部,从而更加激化了喀尔喀内讧。

此外,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袁森坡《乌兰布通之战考察》、《康熙与昭莫多之战》、王思治《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日]石滨裕美子《清代抚远大将军奏折、奏议评介》、[日]香坂昌纪《清朝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邓锐龄《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梁丽霞《西套额鲁特蒙古归附清朝始末述略》、成崇德《论准噶尔政权》、杨建新《准噶尔汗国时期卫拉特蒙古诸部联姻述论》、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达力扎布《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王希隆《分部之前赛因诺颜贵族的活动及其与清朝关系述论——兼论清朝对北方民族的政策》、张永江《国家、民族与疆域——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史》等论文的学术

水平较前明显提高。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清准关系史的研究还是整个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相对处于低落状态,发表的成果明显减少了。

三、史料与研究方法

研究清准关系史时,人们通常利用的史料为《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三大官修史书。通过《清实录》,可知重大历史事件的梗概始末。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实录》在乾隆时期被改动,不少记载与史实有出入。因此,需要与其他史料进行比较,鉴别真伪,判断价值后方可使用。与《清实录》相比,《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为专述某些重大事件的大型史书,其记事的翔实程度远非《清实录》所能比拟。《方略》类史书特点鲜明,基本上是以文件汇编形式写成的编年体文献史料集,虽有作者的评论,但所占比重极少,绝大多数内容为原始档案或被更改的档案。通过与原档的核对,可以订正其某些记载,但在多数原档已经遗失的情况下,有些内容已无法确知其真伪。当然,有些记载可以通过《起居注》和《实录》进一步考订。《方略》对原始档案的改动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对不利于皇帝“圣明”的地方改动较多,其他则似乎无须改动而基本保留了事实的原貌。上述三部大型史料互为补充或引证,对清准关系史的研究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上述三部史料都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的版本,而且相互有一定的区别。就以满、汉两种文字各朝《实录》作对照,二者不仅个别内容相异,而且史实方面满文往往详于汉文。《朔漠方略》也不例外,满文原稿要比汉文译稿翔实。金峰教授整理蒙古文版《朔漠方略》并与满汉版本进行校勘,使蒙古文《朔漠方略》成为了较好的版本。

清朝《起居注》作为重要史料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实录》卷帙浩大,在许多方面确实比《起居注》详尽充实,但是《起居注》有

而《实录》无的记载也不少。《起居注》一经定稿,即不再作更动,记叙与事实较为接近,可作校正其他史料的依据。此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理藩院则例》、《西域图志》等官修史书分别记载了人物、律例、史地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文私人著述在清准关系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梁份《秦边纪略》、魏源《圣武记》、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卫藏通志》、《新疆识略》、椿园《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何秋涛《朔方备乘》、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张穆《蒙古游牧记》、昭槁《啸亭杂录》、盛绳祖《卫藏图志》、傅恒《西域同文志》、福格《听雨丛谈》、王之春《清朝柔远记》、金钟麟《满蒙新藏述略》等书都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清准关系史的内容。上述私人著述虽成书时间或早或晚,记叙内容各有侧重,但都保存了较丰富的史料,已经遗失的一些重要史料被保存其中。并且作者对很多问题的考证、分析和总结也是非常精当的,其史料和学术价值不容忽视。当然,这些作品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不少问题的记载还存在失实和偏颇之处。

档案史料在本文的史料来源中占有突出地位。档案文件是自然形成的,它不同于追记的著述,也不同于据之编写的史书。所以档案文书的准确性比其他史料要高。本文所用档案文献中数量最多、价值最高的为满文档案。《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八、九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满、汉两种,满文保存更为完整)、《抚远大将军奏稿》等满文档案中包含丰富的清准关系史史料,如清朝皇帝的谕旨、臣工的奏折,尤其是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与皇太子之间的谕奏往来保存完整;蒙古方面使臣的报告、降人的供词等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流传至今的这些原档不仅为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史料,而且为订正《方略》和《实录》的记载提供了依据。

保存下来的清康熙年间蒙古文档案,数量可观,范围较广,几乎涉及康熙六十年间史实,这些档案多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蒙文老档》、《蒙古堂档》和《理藩院档案》里。内蒙古大学的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和宝音德力根教授主持整理了上述蒙古文档案并已公开出版。这些沉睡于内廷数百年的珍贵史料,几乎没有被使用,所含内容极其丰富,有不少为其他史料所不载。特别是,噶尔丹东进喀尔喀后喀尔喀贵族与清廷之间的文书往来居多数;噶尔丹与清廷之间的文书往来也为数不少。这些蒙古文原始档案对本书的撰写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托忒蒙古文史料,反映了17、18世纪卫拉特蒙古人自己的记史方法和观点。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卫拉特法典》、噶旺·希拉布《四卫拉特史》、巴图尔·乌巴什·图们《四卫拉特史》、佚名《土尔扈特诸汗史》等文献,肯定其史料价值,并且将其广泛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中。国内整理、翻译和出版托忒文献虽起步较晚,但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笔者查阅了一些托忒文献并且将这些文献与其他史料相结合,以考察17至18世纪的清准关系。

与本书有关的藏文史料,如《五世达赖喇嘛传》、《颇罗鼎传》、《西藏王臣记》等文献中,有大量的满藏、满蒙、蒙藏关系史的史料,对某些事件的记载详于其他史料。本书还利用了清代其他藏文档案文献,如《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等。

本书参考的部分外文史料,有白晋《康熙帝传》、《张诚日记》、《徐日升日记》、南怀仁《鞑靼旅行记》、帕拉斯《蒙古民族历史资料集成》、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德斯得利《准噶尔贵族侵扰西藏目击记》等。这些史书的作者多数为来华之传教士,他们记录了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史书常常讳言的游猎等史实记载清楚。由于他们的著述大都在国外出版,所以无须顾虑,观点较为客观,可成为

中国史料的重要补充。

总之,清准关系史史料种类繁多,卷帙浩大,分布甚广,并互为补充、引证,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史料链条,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将史料变为研究成果,还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1. 以史料学批判作为研究的基础。史书有曲笔,有误记,不能尽信,必须加以鉴别。要做到去伪存真,就需要在了解史料来源的基础上,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态度、资料依据诸方面确定其著作的真实程度。齐木德道尔吉和乌云毕力格二位先生就分别考察有关康熙皇帝第一、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原文档案在满文《朔漠方略》一书的中被利用和流传情况,展示了清代御用史官选择、编排和加工原始史料的种种手段,使该事件的研究得以深入。由于原档保存有限,所以完全依靠原档订正史书记载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情况下,还必须用其他方法鉴别和判断各种史料的价值。

2. 尽量利用多种文字史料。每种文字史料有其独特价值。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封建王朝,在清前期满族军政要员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均以满文为主。在研究清代准噶尔问题方面,满文档案文书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独特地位,其总体价值,是其他文字档案难以比拟的。此外,有不少清代官修史书,如《朔漠方略》、《清实录》等最初也都是以满文形成,记载比较原始,为其他文字版本的底本,相对可信。同时,还可以通过不同文字版本之间的比较,更好地掌握史料流传的情况,为研究提供依据。

本书大量利用了蒙古文史料。其中,蒙古文档案文献反映了蒙古内部情况和满蒙关系,具有内容集中、保存相对完整、查阅方便等特点。以康熙朝为例,各个年份的有关满蒙关系的蒙古文档案保存比较完整,数量也多于满文。当然,清代不少蒙古文档案的满文翻译件也保存较好,可与蒙古文原件对照使用。